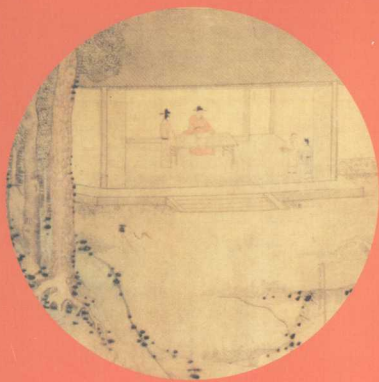




闵泽平 著

南宋“浙学”与 传统散文的因革流变



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
浙江大学出版社

014008723

B244. 99
07



闵泽平 著

南宋“浙学”与 传统散文的因革流变

B244.99
07



北航

C1695304



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
浙江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南宋“浙学”与传统散文的因革流变/闵泽平著.
—杭州:浙江大学出版社,2014.1
ISBN 978-7-308-12453-9

I. ①南… II. ①闵… III. ①浙东学派—研究—中国—南宋②古典散文—古典文学研究—中国—南宋 IV.
①B244.995②I207.6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260595 号

南宋“浙学”与传统散文的因革流变

闵泽平 著

责任编辑 胡 畔(hlpp_lp@163.com)

封面设计 十木米

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

(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)

(网址: <http://www.zjupress.com>)

排 版 杭州中大图文设计有限公司

印 刷 杭州日报报业集团盛元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710mm×1000mm 1/16

印 张 17.25

字 数 251 千

版 印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308-12453-9

定 价 42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

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联系方式:0571-88925591; <http://zjdxcsbs.tmall.com>



北航

C1695304

目 录

第一章 20 世纪对古文运动文学意义的研究	001
第一节 20 世纪前期对古文运动的文学性的质疑	002
一 胡适信手拈出“古文运动”	002
二 胡云翼对古文运动载道宗旨的批评	005
三 郑振铎对古文运动师古倾向的批评	008
四 刘大杰对古文运动非文学性倾向的批评	011
第二节 20 世纪中期对古文运动进步意义的凸显	019
一 李嘉言对古文运动经济基础的关注	019
二 陈寅恪对古文运动政治文化意义的全面提升	024
三 谭丕模对古文运动革新意义的充分挖掘	027
四 钱穆对古文运动纯文学性的赋予	032
第三节 20 世纪中后期对古文运动文学性的反思	039
一 《中国文学史教学大纲》对古文实用性的肯定	039
二 郭绍虞将时文作为古文革新的对象	043
三 章培恒等人对古文运动文道关系的剥离	047
第二章 陈亮及其时文	050
第一节 作为试论进策的《酌古论》与“中兴五论”	051

一	《酌古论》·····	051
二	《中兴五论》·····	069
第二节	作为时文示范的《陈子课稿》·····	071
一	《汉论》·····	073
二	《经书发题》·····	077
三	《问答》·····	080
四	策问·····	082
五	试论·····	086
第三节	通于时文的《欧阳文粹》·····	092
一	《欧阳文粹》的编选宗旨·····	092
二	陈亮的文章观·····	098
第三章	吕祖谦时文研究·····	107
第一节	吕祖谦的文章选本与时文观·····	109
一	《宋文鉴》·····	109
二	《古文关键》·····	117
三	《三苏文集》·····	126
第二节	吕祖谦的时文创作·····	132
一	策问与试论·····	132
二	《东莱博议》·····	143
第四章	陈傅良时文研究·····	156
第一节	陈傅良的时文生涯与时文观·····	156
一	作为时文高手的陈傅良·····	156
二	陈傅良对时文的改造·····	161
第二节	陈傅良的时文创作·····	169
一	陈傅良与《十先生舆论》·····	169
二	陈傅良与《止斋论祖》·····	182

第五章 叶适时文研究	202
第一节 叶适的文学思想与时文观	202
一 “欲集诸儒之大成”的叶适	202
二 “欲弥周程、欧苏之裂”的叶适	206
三 欲兼收并蓄、古今并重的叶适	215
第二节 叶适《进论》研究	220
一 叶适《进论》的治国方略	224
二 叶适《进论》的学术思想	238
三 叶适《进论》的治世理念	247
四 叶适《进论》的文章艺术	254
主要参考文献	263
索 引	269
后 记	271

第一章 20 世纪对古文运动文学 意义的研究

唐宋散文是我国古代散文发展的重要高峰,论及其艺术成就的建立,20 世纪以来,学者多归功于两次“古文运动”。在汗牛充栋的论述中,无数次的重复强化了这一印象:唐宋古文运动将唐宋散文推向了艺术的顶峰,从而奠定了古文的至尊地位。在对古文运动众口一词的颂扬中,细微的差异仅仅体现为对“古文运动”目的、性质以及意义的不同描述。时至今日,不少学者仍然坚守着这样一种文学观念:唐宋散文是古文一家独大的天下,在汹涌澎湃的古文浪潮中,骈文乃至时文溃不成军,无力阻挡这一历史潮流,屹立潮头的唐宋八大家镇定自若地引导着文章演化的方向。

唐宋散文演进的具体状况,在不同时期与不同学者那里也许有着不同的显示,但无论如何,现存的唐宋文章总集告诉我们“古文”只是其中的一部分,尽管我们大多数时候都将目光停留在它们身上^{〔1〕}。人们总是容易看见他们所希望看见的,可摈弃在视线之外的事物并不会就此消失,它

〔1〕 如对于唐代墓志,无数选本强化了散体这一印象,而事实上却非如此。唐长孺说:“从周绍良先生主编《唐代墓志汇编》所收贞元到唐末九百余方墓志看,古文运动兴起后,墓志还是以骈骊文为主。贞元到大中以前五百六十多方墓志中,骈骊体占百分之七十以上,而散文体墓志也都夹杂着骈骊句式。大和时期,我们才发现了像韩愈那样纯用散文写成的墓志,到大中时,这种情况尤为多见,但骈体墓志仍多于散体墓志,而且大中以后,直至唐末,骈骊文在墓志中又再度兴盛,占绝对优势。”唐长孺著:《唐长孺社会文化史论丛》,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,第 224 页。

们依然会默默地固守在那里,等待被发现的那一天,一如当初 20 世纪前期“古文运动”这一文学现象的被发掘。在古文运动与唐宋散文两者关系牢不可破的今日,对它们关系的紧密性哪怕稍作质疑都不会是一种明智的行为。与其爬罗剔抉地寻绎相关事实以为佐证,不如对“古文运动”的叙述史进行梳理,毕竟“古文运动”这一名词出现的历史还不满百年。

在这百年之中,“古文运动”这一术语何以脱颖而出,能为人们耳熟能详呢?当我们回顾 20 世纪人们接受“古文运动”的历史的时候,我们不无惊讶地发现,那些被如今的学者认定是理所当然的结论,即似乎已经进入“前概念”、“前理解”的那些观念,曾经饱受质疑,历经波折,其根基并不如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厚实,虽不至于奠基于流沙之上,面临随时坍塌的危险,却也残留着无数的罅隙,在流水的冲刷下有着加剧的可能。顺着这些罅隙仔细追踪,或许会恍然发现,如今困扰我们的心结,原来在源头就已经存在。或者说,正是在建构新的批评话语体系之初,由于对某些基础性的概念的理解,存在着比较大的争议或偏差,才使人们在歧路上渐行渐远。

第一节 20 世纪前期对古文运动的文学性的质疑

一 胡适信手拈出“古文运动”

在 20 世纪为数不多的对“古文运动”这一概念的质疑声中,最响亮、最集中的是对“运动”这一定义的批评,如“所谓运动,必有一个团体作有计划的种种活动,如文字、口头宣传等。唐代古文家对古文只是个别提倡而已,顶多有若干人响应附和,实在不成为什么运动。‘古文运动’是近人受时风潮流的影响而产生的一个名词”^{〔1〕}。“是否称之为运动,实关系到一个牵连颇广的原则问题。约定俗成,我们称新乐府与古文的提倡为‘运动’,固无可。我们可以说运动有大小,不一定非要对准‘运动’的种种

〔1〕 罗联添:《论唐代古文运动》,韩国《中国学报》第 25 辑,1984 年 9 月第四次中国学国际大会特辑。

严格定义。甚至我们可以更含糊一些,当年胡适先生受新思潮的影响,随机式的称‘运动’,我们也就跟着那样称呼就是了。但问题就来了,类似的现象,如晚明的公安派提倡性灵说,我们称不称其为‘性灵运动’呢?许多的流派,都有主张,参加者也不少,我们称不称‘运动’呢?理论研究是要求严谨的,在论证过程中应该尽量避免随意性,力求做到准确严密。这似乎是一个尚待研究的问题。”〔1〕

“古文运动”能不能或者说该不该称之为一场运动?这一问题的拈出,似乎是颠覆性的,大有釜底抽薪之势。尽管 20 世纪后期的学者,由于诸多原因,对“运动”这一语词不无抵触心理,从而在情绪上对这一做法极易产生共鸣,但这种对“古文运动”的消解并不足以造成致命性的伤害。首先,无论称不称之为“运动”,这一巨大的变化是存在的,即使其时提倡者不多,呼应者也甚少;其次,在对这一变化的描述中,人们从“文运拓新”、“古文复兴”、“文艺革新运动”等诸多概念中选定“古文运动”,看似偶然却存在必然,其间的意义多为人忽略处;最后也是最重要的,这种消解看似颠覆性,却是外围的,“古文运动”的核心在于“古文”,这个概念出现的意义在于描述“古文”如何走上历史舞台并成为正统与正宗,但事实上对于“古文”的涵义却从来没有彻底厘清过,这导致人们对这一运动的理解出现了较大偏差,从而使赞同与批评都偏离了目标。

在胡适推出“古文运动”这一概念之前,20 世纪之初的学者在面对唐宋文章的变化上,曾经用“复兴”、“革新”、“拓新”等诸多语词来描述。1915 年,曾毅在他的《中国文学史》第二十二章“欧阳修与文运拓新”中开篇写道:“起赵宋文运之衰而为一代诗文宗匠以转移天下之风气者,惟欧阳修。修固宋文学界极有力之人也,然六朝之绮习,而后有伯玉(陈子昂)之高纵,有元结、独孤及之前驱,而后有韩昌黎之矫厉,壮文界革新之势力。夫固有筌路蓝缕以启山林者,则尹师鲁、苏舜钦、梅圣俞之功不可忘

〔1〕 罗宗强:《20 世纪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之回顾》,《古代文学理论研究》,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2 年版,第 32 页。

也。”〔1〕曾氏称自陈子昂、元结、独孤及至韩愈的文章变革为“文界革新”，而尹洙、苏舜钦、欧阳修等人诗文革新为“文运拓新”。欧阳修等人的“拓新”，自然是承接韩愈等人的“革新”而来，不过曾氏特别指出，这种承接沿袭仅仅指散文而言，尽管宋代骈文也发生了剧烈变化，欧阳修等人也对偶俪之文进行了诸多改造〔2〕。

1918年，谢无量用“古文复兴”来描述庆历以来文章的变化。在他的《中国大文学史》中，古文创作是从萧颖士、李华诸人开始的，而后韩、柳形成古文一派，至宋初经过多人的努力，迎来庆历年间的文章复兴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无论曾毅还是谢无量，对于唐代文章的变化虽然给予了一定程度的关注，但其重视程度远远无法与后世相比。曾氏以为“自韩、柳以古文为天下倡，其承流而变者，固已有人，而卒以得位未崇，偃草力弱，骈俪之余波浸染甚久，回荡转振，其势未能遽熄，至于宋而古文始大畅其风。韩、柳之功，在唐为小，在后世为甚巨”〔3〕，谢氏则以为“唐文学之特质仅在诗歌，宋文学之特质，则在经学、文章之发达”〔4〕，他们都认可宋代文章的大兴与韩、柳的改革有关，但韩、柳的变革还不足以在当时就引发颠覆性的变化，所以他们在文学史中对于宋文都开辟了“拓新”、“复兴”等专章来进行论述，至于韩、柳之文则停留于“派别”介绍的层面上。这似乎是其时人们的共识，在众多的文学史中我们不难发现存在过许多类似的判断〔5〕。

饶有趣味的是，当胡适首先拈出“古文运动”这一概念时，也是将它与

〔1〕 曾毅：《中国文学史》，泰东图书局1915年版，第191页。

〔2〕 “（欧阳）修于散文既以韩为宗，力振古学，挈有宋文章之领矣，而朝廷制诰、缙绅表启如英公、大小宋，固犹未脱杨刘之绮习也，修奋然为之，独尚雅雋，行以流转之笔，……子瞻兄弟更号英伟，去浓丽而宗雅淡，遂蔚为宋骈体之特色，而风气亦自修开之。修成人杰矣哉。”曾毅：《中国文学史》，第196页。

〔3〕 曾毅：《中国文学史》，第171页。

〔4〕 谢无量：《中国大文学史》卷八第十章“宋文学之大势及五代文学之余波”第一节“宋文学总论”，第1页。中华书局1918年初版，1940年版。

〔5〕 如赵景深《中国文学小史》（上海光华书局1928年版），于唐仅介绍诗歌与小说，韩愈虽名列其间，却是与刘长卿并称为“苦吟诗人”，于宋辟有专章“宋散文家”。王梦曾《中国文学史》（商务印书馆1914年版），唐代文学属于其所谓“词胜时代”，古文难觅踪迹，而宋代文学属于“理胜时代”，是“古文昌盛时期”。

宋代文学联系在一起。1927 年,胡适首先在《国语文学史》中指出:“古文自韩、柳之后,中间经过晚唐的骈偶文复辟,势力又衰落了”,“古文运动是反对骈文的,是要革骈文的命的”,“到了第十一世纪中叶,欧阳修的古文成为一代宗师;他的同乡曾巩、王安石都是古文的好手;西南方面又出现了苏轼、苏洵、苏辙父子三个文豪。古文的八大家之中,六大家都出在这一个时代。古文运动从此成功;虽不曾完全推翻骈文,但古文根基从此更稳固了,势力也从此更扩大了”〔1〕。第二年,胡适又在《白话文学史》上册蜻蜓点水般地拈出了“古文运动”这个词语〔2〕。在第十五章“大历、长庆间的诗人”论及韩愈的诗歌时,他顺便说道:“韩愈提倡古文,反对六朝以来的骈偶浮华的问题。这一个古文运动,下编另有专章,我在此且不讨论。在这一章里,我们只讨论他的诗歌。”〔3〕他言之凿凿地告诉我们以后会详细讨论这个问题,不过,我们终究没有等到他的进一步论述。

二 胡云翼对古文运动载道宗旨的批评

值得注意的是,尽管胡适没有详细阐述“古文运动”这一概念的具体涵义,从他之前对唐代诗人的评述中,我们大致可以推断出他所谓的“古文运动”,是他所倡导的“文学革新运动”的组成部分之一。他所感兴趣的,是一个与旧习俗、旧传统迥异的文学变革,他的着眼点则在于“新运动”。真正首次从新运动的角度来全面论述唐代文学变化的,是胡云翼。1931 年,胡云翼在他的《新著中国文学史》第四编论述唐代文学时,将其内容分为四个章节,依次为“唐代的文学运动”、“唐代的诗歌”、“唐代的歌

〔1〕 胡适:《国语文学史》,安徽教育出版社 1999 年版,第 93—95 页。《国语文学史》一书的刊行情况较为复杂,初稿为石印讲义,写就于 1921 年 11 月,修订增补后,由北京文化学社 1927 年 4 月初次出版。

〔2〕 中国台湾学者罗联添说:“中国文学史,最先用‘运动’这个名词的是民国十七年出版的胡适《白话文学史》。例如他称天宝以前诗人‘只能做那个新运动里的几个无名英雄而已’,认为‘白居易与元稹都是有意作文学革新运动的人’。”(罗联添:《论唐代古文运动》,载陈弱水、王泛森主编《思想与学术》,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05 年版,第 61 页)严格讲来,这里还只是提到“新运动”与“文学革新运动”,还不能与后文所言“古文运动”等同视之。

〔3〕 胡适:《白话文学史》,新月书店 1928 年初版,1939 年版,第 414 页。

词”、“唐代的小说”。所谓“唐代的文学运动”，在他的眼中实际上就是唐代古文的革新运动，亦即我们今日所说的“古文运动”。而唐代文章演进的历史，也就是古文压倒骈文的历史。唐代古文的兴起，源于对骈偶文字的改革：“骈偶绮艳的文学，经过两晋六朝长期的发展，其风气已深中人心，虽受一部分文人的反对，和隋文帝政治手段的压迫，结果亦不甚奏效。隋文帝的儿子隋炀帝就是喜欢写绮文艳思的一个。故至唐之初期，还是骈偶绮艳的文风流行着。……直至陈子昂起来，才极力提倡有风骨的朴实的汉魏文学，反对晋宋以后的颓靡文学。……自此，萧颖士、李华、元结、独孤及、梁肃诸人继起，皆宗法陈子昂，继续倡导文学复古之论。至韩愈、柳宗元两大文豪起，古文运动乃底于成功。”唐代古文的衰落，表现为骈偶文风的复兴：“古文运动有韩、柳二氏的努力而达于最高的发展。继之者有李翱、皇甫湜等，皆以才力文誉不及韩、柳，不足号召天下，古文之书逐渐衰。至于晚唐，绮艳的骈偶文学又复活起来，把古文打倒了。”〔1〕

总之，胡云翼认为，唐代文学运动之所以称之为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文学革新运动，就在于其间古文对骈偶文字的胜利。打倒绮艳的骈偶文字，既是这场文学运动的旗帜，也是它的价值之所在。因此，在谈到唐代文学运动的好处时，胡云翼总结为四个方面：“第一，唐代古文学运动的实际，乃是一种提倡朴实散文的运动”；“第二，有这个时期的文学运动，阻遏了骈偶绮艳文学的发展”；“第三，这个时期的文学运动，因为反对空疏浮华不能致用的纯文学，乃揭出明经载道以为做文章的目的”；“第四，这个时期的文学运动，因为要矫正骈偶文学的堆砌藻饰、隐晦难懂的毛病，乃改用浅近流畅的文言来做文章”。在这里，我们不难发现，作者始终站在古文的立场看待这个文学运动，并且自始至终将骈偶文字置于它的对立面，虽然他意识到唐代新兴的散文是南北文学合流的结果，“实际上是受了南朝文学的洗礼，归于北朝稳定的质朴，是能够兼南北文学之所长的”〔2〕。

正因为把古文与骈偶文字置于对立的两极，他才把唐代的文学运动

〔1〕 胡云翼：《新著中国文学史》，上海北新书局1933年初版，1947年新1版，第108—111页。

〔2〕 胡云翼：《新著中国文学史》，上海北新书局1947年版，第113—114页。

理解为此消彼长、敌进我退,而古文运动的意义也就仅仅停留在对骈文的胜利上,古文的价值也主要体现在实用方面。从他对唐代文学运动的批评中,我们可窥一斑:“这个文学运动自然有许多缺点:第一是不应该以复古为名,埋没了文学进化的观念;第二是不应该以文学为载道的工具,忽视纯文学的价值。”〔1〕由此看来,作者内心其实充满了矛盾。一方面他将唐代古文的兴盛称之为场重大的文学革新运动,另一方面他对新兴古文的文学价值并不太认可。所以,从他对唐代文学的描述中,我们发现能够体现他的“纯文学价值”的依然是唐代诗歌、歌词与小说。事实上,在编撰文学史之初,他就曾阐明了他的“纯文学”立场〔2〕。在这个立场下,古文不能说排斥在外,也最多只是龟缩在一隅。

这种在西方思潮影响下形成的文学观念,使他对宋代古文评价不无偏颇。与唐代文学运动一脉相承的宋代文学运动,虽然使古文取得了压倒性的优势,“于是古文的势力乃确立了不可动摇的基础,自此以后,至于清末,八九百年的文章完全是古文的权威,骈体文便衰落下去了”,但这并不足以让我们欢欣鼓舞,因为“宋代古文运动的理论,最障碍纯文学的发展,这是文学史上不幸的事”。而不幸的根源,即在于作者认为骈文与古文势同水火。“在文学史上,骈文和古文向来是站在对抗的地位的。骈文注重艺术,倾向唯美主义,其作品多是美术文,属于纯文学一类;古文注重实用,倾向于功用主义,其作品多系实用文和学术文,属于杂文学一类。……宋代的学者,在注重‘文以载道’的一点上,意见都是一致的。他们既然认定了‘文以载道’的观念,自然要反对骈文,甚至于反对纯文学,而极

〔1〕 胡云翼:《新著中国文学史》,上海北新书局 1947 年版,第 113 页。

〔2〕 “文学向有广狭二义,广义的文学即章炳麟所说‘著于竹帛之谓文,论其法式谓之文学’,即是说一切著作皆文学。这样广泛无际的文学界说,乃是古人对学术文化分类不清时的说法,已不能适用于现代。至于狭隘的文学乃是专指诉之于情感而引起美感的作品,这才是现代的进化的正确的文学观念。本此文学观念为准则,则我们不但说经学、史学、诸子哲学、理学等,压根儿不是文学,即《左传》、《史记》、《资治通鉴》中的文章,都不能说是文学,甚至于韩、柳、欧、苏、方姚一派所谓的‘载道’的古文,也不是纯粹的文学。(在本书里之所以有讲到古文的地方,乃是借此以说明各时代文学的思潮及主张。)”胡云翼:《新著中国文学史·自序》,上海北新书局 1947 年版,第 5 页。

力提倡朴实致用的古文。”〔1〕

胡云翼有关“古文运动”的论述,值得玩味处颇多,其中有三点尤其值得注意:首先,他虽然肯定了古文的价值,却将其排除在纯文学之外,真正能够展示文章艺术之美的是骈文;其次,古文之所以受到排斥,是它的功能主要在于实用,尤其体现为载道;最后,古文运动的意义主要体现为文体的改革。他的这些观点并不是独有的,而是时代情绪的普遍表达。

三 郑振铎对古文运动师古倾向的批评

在胡云翼《新著中国文学史》出版的次年,郑振铎的《插图本中国文学史》面世。相比于胡氏的新著,郑作对于古文运动的认识似乎更为清晰,它明确地以“古文运动”与“古文运动的第二幕”来专门概述唐宋文章的发展,而不再含糊笼统地称之为“文学运动”,而古文运动这一称呼也随着“插图本”影响的扩大而渐次深入人心。不过,虽然作者在例言中表示“本书着重于每一个文学运动,或每一种文体的兴衰”,但书中对唐宋古文运动的论述反而不如胡氏新著更为细致,其评价也不比后者为高。在郑振铎那里,古文运动的意义仅仅停留在文体革新的意义上,即解骈为散。“古文运动是对于魏晋六朝以来的骈俪文的一种反动,严格地说,乃是一种复归自然的运动,是欲以魏晋六朝以前的比较自然的散文的格调,来代替六朝以来的日趋骈俪对偶的作风的。”〔2〕这一运动的结果,自然也就是古文代替骈文成为文坛的正宗。“大约从韩柳以后,古文的一体,便正式的成为文学的散文了。凡欲为文士,欲得文名传于后世,便非学作古文不可,而骈俪文在文坛上的运命遂告了一个结束。”〔3〕因此,郑氏特别指出“古文运动的成就并不怎样伟大”,“他们是兜圈子走的,并不是特创的,且

〔1〕 胡云翼:《新著中国文学史》,上海北新书局1947年版,第169—171页。

〔2〕 郑振铎:《插图本中国文学史》,第二十八章“古文运动”,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,第307页。郑振铎《插图本中国文学史》本于1932年12月由北平朴社初版,1957年修改了个别字句,续撰了第六十一章至六十四章,删去了附录“新文坛鸟瞰”,后由作家出版社重印出版。文中所用版本,除订正不必要的错误外,对原文没有作任何改动,见其“再版前言”。

〔3〕 郑振铎:《插图本中国文学史》第二十八章“古文运动”,第313页。

不曾创造出什么新的东西来,故其成功究竟有限,只是把散文从六朝的骈俪体中解放出来而已”,“故虽是一场文学改良运动,却究竟还不是什么真正的文学革命运动”。〔1〕

胡云翼与郑振铎对古文运动均有所訾议,但两人批评的着眼点并不一致。胡氏新著,对古文运动的旗帜即“载道”的宗旨尤为不满;而郑氏的插图本,则指责韩愈诸人“托古改制”,缺乏独创的艺术精神,即对古文运动的创作方式不愿认同。对载道的古文进行批判清算,正是新时期文学革新运动的基石之一。胡适《文学改良刍议》所谓“八事”,大半针对古文流弊而言。而陈独秀虽然承认韩愈是文界豪杰之士,肯定他变八代之法,开宋元之先,但终究只是适逢其会而已,“昌黎之变古,乃时代使然,于文学史上,其自身并无特色可观也”。他对于韩愈的不满,除了师古的创作倾向外,就是载道的创作宗旨。“文学本非为载道而设,而自昌黎以迄曾国藩所谓载道之文,不过抄袭孔孟以来极肤浅极空泛之门面语而已。余尝谓唐宋八家文之所谓文以载道,直与八股家之所谓代圣贤立言,同一鼻孔出气。”〔2〕

事实上,对于韩愈“师古”倾向的不满,是 20 世纪初期人们的共识。正是由于对韩愈的创造性缺乏认同,人们对古文运动复古的倾向更为关注,而对其革新的一面较少挖掘。20 世纪初,林传甲在京师大讲堂评点中国传统文学时所留下的《中国文学史》,历来被认为是中国文学史的开山之作〔3〕。一个世纪之后,重温这部文学史,我们不能不惊讶地发现他对韩愈及其唐宋古文家的看法,实在是与当今的潮流相去甚远。在他看来,韩、柳诸人的复兴古文的努力,是一场实实在在的复古,始终停留在模仿的层面上,而且这种模仿还只是腔调的模仿。相对于失败的模仿者,他

〔1〕 郑振铎:《插图本中国文学史》第二十八章“古文运动”,第 312 页。

〔2〕 陈独秀:《文学革命论》,《新青年》第 2 卷第 6 号,1917 年 2 月 1 日。

〔3〕 对于林传甲《中国文学史》第一部的地位,近年来不断有人提出质疑。如陈国球《“国文讲义”与“文学史”之间——林传甲〈中国文学史〉考论》即认为林著文学史意识并不强,只能称作讲义,与现今文学史著述并不相同。见《中国雅俗文学研究》第一辑,朱栋霖、范培松主编,上海三联书店 2007 年版。

们的成功仅仅在于语言更为明白晓畅,其实质与他们所批评的齐梁文学并无二致^{〔1〕}。为什么林传甲会产生这样的看法呢?首先自然与他的文学退化论有关^{〔2〕};其次则与他过分关注文体的变化有关。在他看来,一部传统文学史,似乎就是文体源流变迁的历史^{〔3〕}。韩愈在文体上虽有所创造,但这种改变只是为了适用而已:“韩昌黎之文体,自出新裁,非沿袭前人也。……昌黎初学独孤及之文,继而学司马相如、扬雄之作,深知世俗学文恒肖其形貌,故独运精思、别开生面焉。盖古人文字未备时,每有新器而无名者,则造新字以名之。有新意而不能达者,则造新句以达之。昌黎之意,实上契仓籀创字之意,是以谓之古文也。独孤及诸家交骈文为散文,犹解汉隶为散隶耳。昌黎以大气运之,则如草书应急,无不可达之意,用以治事而事无不治矣。至于纪述明畅、议论严警,尤非骈体所能为。虽时人莫之许,而后世尊用之。”^{〔4〕}他认为韩愈“古文”的出现,与上古“古

〔1〕 林传甲《中国文学史》第十四篇“唐宋至今文体·总论古文之体裁名义”：“古文者，汉人称仓籀篆文之谓也。凡龙凤之书、蝌蚪之字者，皆谓之古文，盖以秦汉以前为古文也。唐宋至今，所谓古文家，名为上溯孔孟，实则模拟两汉而未能也。周隋之士，已厌南朝文体之陈滥，物极必反，唐人乃别出新法，自成一派，遂以古文为专门名家。夫汉魏六朝，其文体之变也以渐，世人趋之而不觉。唐初四杰之才，亦徒知齐梁为近古也。昌黎欲自出新法，又惧其惊世骇俗，行之不远，不得已托言前古，以示有所征信，可以钳守旧者之口耳。虽然，极六朝之弊，不过揣摩声调也；极八家之能事，亦不过揣摩声调也。同一揣摩，反唇相讥，是以五十步笑百步也。唐宋诸家古文之佳者，不过明白晓畅而已。”《京师大讲堂国文讲义·中国文学史》，上海科学书局1916年版，第169页。

〔2〕 如其林传甲《中国文学史》第十四篇“唐宋至今文体·总论古文之体裁名义”云：“必欲步骤两汉，则昌黎《进学解》，不逮东方朔之《客难》，其《送穷文》亦不若扬雄之《逐贫赋》。然唐人学两汉者，犹力求典重。宋人学韩柳者，渐运以轻虚。明人学唐宋八家者，则在流连跌宕之间而已。近人学八家不能成，充其量仅肩随于明之归震川。岂上古必不可学乎？抑学之未得其道乎？”其论宋代诸家，有以为不如唐代作者：“杜牧之文，选八家者弃而不收，而苏氏之平淡者亦收之，明人无识之甚也。至于王安石文笔刻露，不过唐之牛僧儒。曾巩之文笔纤徐，不过唐之元稹。盖不仅欧公之文出于昌黎也。彼选唐宋八家者，固不足以语唐宋之流别矣。”上海科学书局1916年版，第169页。

〔3〕 其论述骈文的历史，有云：“文章难以断代论也。虽风会所趋，一代有一代之体制，然日新月异，不能以数百年而统为一体也。惟揣摩风气者，动曰某某规摹汉魏，某某步趋六朝，某某诵习唐骈文，某某取法宋四六。然以文体细研之，则汉之两京各异，至于魏而风格尽变矣；六朝之晋宋与齐梁各异，至于陈隋而音节又变矣；而唐四杰之体，至盛唐晚唐而大变，至后南唐而尽变矣；宋初杨、刘之体，至欧、苏、晁、王而大变，至南宋陆游而尽变矣。”林传甲《中国文学史》第十六篇“骈文又分汉魏六朝唐宋四体之别·总论四体之区”，上海科学书局1916年版，第196页。

〔4〕 林传甲：《中国文学史》，上海科学书局1916年版，第171页。

文字”的出现,意义是一致的,都是为了表达的需要。古文虽然在议论与叙事方面有超越骈文之特色,但更能展现文学之美的还是骈文。

林传甲认为,韩、柳等人相对于其他复古者而言,本质上并没有太大的区别,只是在模仿的过程中更为成功而已。这一观念,在此后的文学史中较为常见。如“古文的运动,起于初唐,到中唐韩愈、柳宗元诸人出,才成了文学上一个支派,叠经挫折,至宋欧阳修、曾巩、王安石、苏轼诸人兴起在文学史上,成了一个大潮流。后世研究古文的人,无不推崇唐宋诸家。这种运动最大的功劳,在打倒不自然而雕琢过度的骈文的权利。它的流弊,在模仿古代文字,无独创的精神,在文学史上不占重要地位。不过,古文做得好的,的确刊落声华,屏绝雕饰而能一唱三叹,情韵悠然。用文学的尺来估量它,它的旨趣,好像自由诗”〔1〕。

四 刘大杰对古文运动非文学性倾向的批评

让我们感到诧异的是,陈冠同对优秀古文的肯定,主要在于它的情韵与旨趣,如自由诗一样。这种以诗的标准来评判古文,细想来正是其时所盛行的“纯文学”的立场。在胡云翼的《新著中国文学史》中,我们已经见证了他是如何小心翼翼地绕过这个敏感话题的。写于 1940 年而问世于 1941 年的刘大杰《中国文学发展史》,在对古文运动的评述中相当醒目地凸显了他的“纯文学”立场。在他看来,古文运动兴起的历史,正是唯美主义思潮逐渐遭受抑制的历程。这使他对唐代以来就备受斥责的六朝文学抱有特殊的好感,至于那些被我们如今标榜为古文运动先驱者的改革家,在他眼中却是逆行者。在第十二章“唐代文学的新发展”中,作者曾这样描述古文运动的历史背景:

中国文学观念的解放,起于建安,经过陆机、葛洪、钟嵘诸人的发挥讨论,伴随着那思想自由的时代,于是那长期文学的发展,达到了独立的艺术的阶段,纯文学占了正统地位。无论文章

〔1〕 陈冠同:《中国文学史大纲》,上海民智书局 1931 年版,第 99—100 页。